

亚历山大帝国分裂的原因探析^{*}

孟凡青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市 300071)

摘要:亚历山大经过十年东征建立了空前的大帝国,然而他遽然去世之后,帝国立刻面临着分裂的危险。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虽然不断涌现出试图将帝国统一在自己治下的继承者,但经过四十年的征战,亚历山大帝国最终仍走向了分裂。从亚历山大帝国的分裂中,可以看出马其顿继承制度和传统观念对帝国统一的制约及王室衰微对帝国分裂的加剧。当然,在继承者中始终存在分裂和统一的两种倾向,而统一者由于自身力量的限制,在其他继承者的联合反对下一再遭到失败,是亚历山大帝国分裂的主因。此外帝国的分裂也与帝国自身现实有一定的关系。

关键词: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原因;佩尔迪卡斯;托勒密;古希腊

中图分类号:K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5-0174-07

由古代世界各大帝国的兴起与消亡来看,为使帝国能够长期延续并发展下去,必然要有一个成熟的组织机构或雄才大略的领导者,否则将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从西方的罗马帝国到东方的秦汉帝国无不如此。亚历山大征战十年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大帝国,但是失去这个“天才”的领导者之后,帝国也立刻面临着分裂的危险。然而,是不是只有亚历山大这样的领导者才能避免帝国的分裂?在他去世之后,不断有继承者试图将帝国统一在自己的治下却始终难以成功?这将是本文试求探寻的答案。

一、马其顿继承制度与传统观念对帝国统一的制约及王室权威的衰微

亚历山大去世后,王位继承立刻成为其部将争夺的焦点,这为帝国分裂埋下了伏笔。亚历山大去世时并未明确指定王位继承人,只说将王位留给“最好的人”^{[1]VII.26},并把象征权力的戒指交给了骑兵长官佩尔迪卡斯(Perdiccas),因为此时在巴比伦的部将中其地位最高。当时佩尔迪卡斯提出王位继承人等亚历山大的遗腹子出生后再做决定,若为男孩则立为国王,自己暂行摄政职务。但佩尔迪卡斯的提议遭到其他继承者和士兵的强烈反对:一是佩尔迪卡斯虽然此时地位最高,但仍没有足够的威望让其他继承者认可和顺从;二是即使亚历山大的遗腹子出生后为男孩,有权继承王位,但遗腹子仍有一半伊朗血统。这令东征以来一直反对波斯人与自己平分权力的马其顿人无法接受,更何况佩尔迪卡斯借此可以大权在握。

在反对者中,表现最激烈的是以梅利埃格(Meleager)为首的步兵。他们大多出身于马其顿农民,希望有朝一日重新回到马其顿过他们传统的生活,因此步兵推出腓力二世智力不健全的儿子阿里戴乌斯(Arrhidaeus)为国王,毕竟他具有合法的血统。而曾率领亚历山大东征军由海路返回巴比伦的继承者尼阿库斯(Nearchus)则推出亚历山大的私生子赫拉克勒斯(Heracles)。托勒密(Ptolemy)则依据马其顿平等传统主张继承者应享有平等的权力。当意见的分歧导致以佩尔迪卡

^{*} 收稿日期:2013-10-07

作者简介:孟凡青,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斯为首的骑兵与步兵即将兵戎相见之时，最终双方在优美尼斯(Eumenes)的调和下达成协议：亚历山大与罗克珊(Roxane)的孩子若为男孩，则与阿里戴乌斯共同被立为国王，分别为亚历山大四世和腓力三世。这样在马其顿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双王现象。

双王现象的出现显然是各方妥协的产物，但同时也反映了马其顿继承制度的不完善及对帝国统一的制约。马其顿并不存在严格的长子继承制，从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的继位中也可看出这种现象，腓力二世从其侄子手中夺得王位，而亚历山大也不是腓力二世的长子。据普鲁塔克记载，奥林匹娅斯(Olympias)为使亚历山大继承王位，用药物致使阿里戴乌斯心智不全^{[2]Lives VII. Alexander LXXVII}。从亚历山大的遗嘱把王位留给“最强者”来看，这也显示出王位继承人并不是自己的遗腹子或阿里戴乌斯。在马其顿的继承传统中，既有父死子继的状况，也有兄死弟继的现象。因此，马其顿继承制度的不完善，在当时缺少合法继承人的情况下，出现王位之争是必然的，这也为帝国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此外，根据马其顿的传统，军队和民众大会有选举国王的权力，而且还可以强制任命和批准正常父系之外的继承^{[3]25}。但是“马其顿公民大会和军队有选举国王权力”的说法一直备受争议，是公民大会和军队来选举国王，还是他们只是赞成前王关于继承人的决定尚不清楚^{[4]377}，一般认为王位继承人由与前王关系最密切的人担任。因此，亚历山大四世和腓力三世共同被立为国王的现象实质为对马其顿传统继承制度的恢复，也容易被继承者接受，不管他们是否有能力统治帝国。继承者在亚历山大王位继承问题上达成协议，也可以说是马其顿传统的再次被利用，得以把两位无能力的国王推上当时复杂的政治舞台。因为不管怎样，阿基德(Argeadae)家族已在马其顿统治了近三百年，还具有唯一的合法地位。将领和士兵仍对王室存有很深的依恋，从士兵多次站在王室成员一边，也可以看出王室仍有余威。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的征战毕竟给他们带来了足够的财富和荣誉，正如亚历山大在一次军队演讲中所说的那样，是腓力二世使他们从披着羊皮贫穷流浪的状态转化为城市居民，并用良好的法规和风俗教化他们^{[1]VII.9.2}。正因如此，继承者们也总想与王室建立联系来寻求自己的合法性：佩尔迪卡斯因得到亚历山大的戒指，其地位得以突出、此后托勒密以占有亚历山大的尸体并安葬到埃及来代表自己的正统、优美尼斯也以拥有亚历山大的帐篷来抑制后来不听从他领导的东方联军。继承者中欲与王室联姻者在此后更是不断出现。

毕竟两位国王无能力统治帝国，因而摄政辅政不可避免。但在马其顿平等观念影响下，其他继承者对摄政的挑战也在所难免，这种平等传统对帝国统一亦存在很大的制约。其缘由为：第一，从马其顿君主制的发展来看，马其顿还没有形成绝对的权威意识。在亚历山大之前，马其顿国王犹如古希腊荷马时代的国王一样被看成军事首领的角色，国王通过赠礼和授予土地来赢得贵族的支持^{[4]380}。尽管随着东征的不断胜利，亚历山大也开始像波斯国王那样推行自己的绝对权威，神化自己并强行让将领行匍匐礼(proskynesis)，但这些都遭到伙友的激烈反对，因为他们习惯上把国王看成自己的战友，而非他们的主人^{[4]380}。国王只是他们同类中的第一人^{[5]38}。这种观念从后来建立的安提柯王朝对马其顿传统的恢复中也可以看出：其他王朝都进行了国王崇拜，而安提柯王朝却没有实行。因此，摄政佩尔迪卡斯不顾其他继承者的感受，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是绝对行不通的。第二，其他继承者更担心由于国王的无权威和无能力，佩尔迪卡斯可能会取而代之。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而是在马其顿历史上屡见不鲜，阿克索劳斯(Archelaus)的继承者就被其摄政所杀^{[6]XIV.37.6}，腓力二世也对他侄子的王位取而代之。在继承者中呼吁佩尔迪卡斯为王者大有人在，其支持者阿瑞斯托诺斯(Aristonous)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在亚历山大之子出生前，佩尔迪卡斯一直没有确定是当国王还是摄政，这也是他当初提出等亚历山大孩子出生后再决定继承人的原因^{[7]51}。

虽然依据王室血统和合法观念，亚历山大四世和腓力三世共同被立为国王，但这个婴儿和愚人的继位毕竟是当时政治的权宜之计^{[3]26}。他们无能力统治帝国，摄政辅政又难以服众，王室衰微不可避免。但为什么马其顿王室此时仍有王室女性存在，却没有出现母后摄政以遏制王室衰微，维持

王室权威的局面呢？腓力二世的母亲幼律狄克一世(Eurydice I)不也曾出来主政吗？而此依然与马其顿传统观念有关。我们通过马其顿传统可以得知，马其顿向来反对女性干政。亚历山大东征期间，其母奥林匹娅斯因处处干涉安提帕特(Antipater)的政务而被迫出走马其顿，当然她现在更没在巴比伦。马其顿从腓力二世到亚历山大一直处于四处征战之中，士兵不希望女人成为他们的女王^{[2]Lives VII. Alexander LXVIII}。此后腓力三世的妻子幼律狄克二世的干政也先后遭到佩尔迪卡斯和安提帕特的反对，安提帕特临终时的遗言也是规劝马其顿人不可让妇女主政^[8]。待亚历山大四世出世，其母罗克珊出来主政也是不可能的，毕竟她是伊朗人，根本不会被马其顿将领所支持。因此，马其顿反对王后主政的传统又间接消弱了王室权威。

两位国王无能力统治帝国，马其顿平等传统和尚未形成的权威意识及反对王后主政的传统，不仅使王室权威不断下降，也对继承者的约束力越来越微弱。继承者的离心力越来越大，帝国的分裂趋势也日益加剧。从佩尔迪卡斯携王室以自重，到安提帕特担任摄政时绕开其他继承者，任命波吕裴康(Polyperchon)为帝国摄政，王室为共主的概念也越来越淡化。安提帕特任命波吕裴康虽然是出于维护王室利益的目的，但是依据后者的威望和能力根本无法保证王室的权威，更不能对其他继承者进行驾驭，致使安提柯公开抢夺罗德岛呈送给国王的贡金^{[6]XVIII.52}。虽然波吕裴康请出奥林匹娅斯，但这不仅给马其顿带来了灾难，更加速了王室成员的不断消亡。

到安提柯势力变得强大谋求统一时，继承者们已不再顾忌王室的存在，卡山德为了确立自己在马其顿的统治，更把亚历山大四世和罗克珊杀害，王室权威损失殆尽，帝国失去了继承者共同维系的纽带，助长了继承者的分裂倾向。王室灭亡，继承者则感到一种轻松，从此再也不存在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他们更加珍惜自己的领土，好像这是他们用长矛获得的一样^{[6]XIX.105}。公元前306年他们便无所顾忌地各自称王。当然各继承者也深知他们称王的不合法性，因此在此后各自的王朝统治中便寻找自己的保护神，进行王权神化和王朝崇拜，以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

二、继承者中统一者的不断失败，各方最终达到力量的平衡

如果说缺乏强有力的继承人而导致王室权威衰落，进而造成对继承者缺乏有效的控制，那么，继承者中关于统一和分裂两种倾向的征战则是帝国分裂的直接和主要原因。虽然在继承者四十年的征战中，不断涌现出像佩尔迪卡斯、安提柯(Antigonus)、德米特里(Demetrius)和塞琉古(Seleucus)这样有统一欲望的继承者，但由于他们自身的局限性，并未把帝国统一在自己的治下。最终各方达到力量的平衡，奠定了三大希腊化王国的基础。

亚历山大去世后，并不是当地的民族主义威胁了他在亚洲的事业，而是他曾经伙友的争斗^{[3]33}。据狄奥多罗斯记载，亚历山大去世时曾说“我预见一场大战将在我的葬礼中上演”^{[6]XVIII.1}。他的这种预言很快变成现实。佩尔迪卡斯成为帝国摄政后，将帝国统一在自己治下的愿望也一步步展开，正如奈波斯所说：“佩尔迪卡斯所谋划的，也正是王国每个人所渴求的，就是将瓜分的帝国统一在自己的治下。”^[9]佩尔迪卡斯为此采取了诸多措施：首先，排除异己。当骑兵和步兵在优美尼斯的调解下达成协议之后，佩尔迪卡斯便假借腓力三世的名义把反抗自己最激烈的步兵将领梅利埃格除掉，减少掌握最高权力的阻力。其次，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行省划分。他将有力的继承者都安排到远离巴比伦的地方做总督。托勒密掌控埃及，安提帕特管理马其顿，实力不强的阿康(Archon)成为巴比伦总督^{[6]XVIII.3}。第三，树立威望。亲自率兵攻下卡帕多西亚地区，使自己威望大增。因为这些地区在亚历山大远征时并没有彻底征服，而只是保证有一条从欧洲到亚洲腹地的通道。

虽然佩尔迪卡斯有极其强烈的统一愿望，但其劣势也很明显：第一，佩尔迪卡斯得不到广泛的认同。在道义上他与安提帕特和克拉特鲁斯(Craterus)都无法相比，因为他们才是王朝合法性的真正捍卫者，而且能够统帅本土的军事资源^{[3]26}。在亚历山大的将领中佩尔迪卡斯至多居于第三位，由于亚历山大去世时安提帕特和克拉特鲁斯都不在巴比伦，亚历山大才把象征权力的指环交给

了佩尔迪卡斯。第二，佩尔迪卡斯也得不到其他将领的衷心支持。佩尔迪卡斯担任摄政之后，没有什么可以暗示他相信任何人^[10]。每个人都怀疑他，他也怀疑每个人^{[5]49}，这使继承者都与他针锋相对。第三，佩尔迪卡斯的婚姻更使他陷入困境。安提帕特把女儿许配给他，但是奥林匹娅斯为了拉拢佩尔迪卡斯，希望他与其女儿克里奥帕特拉(Cleopatra)结婚，最终，佩尔迪卡斯决定接受克里奥帕特拉，这使安提帕特与他公开对抗，更让其他继承者怀疑他为称王而联姻王室的意图。第四，佩尔迪卡斯没有绝对的军事实力来进行他的统一事业。由于佩尔迪卡斯树敌太多不得面临两线作战之苦，出征埃及时因众叛亲离被部将谋杀。可以说佩尔迪卡斯的急于求成与驾驭部下的能力不足使他试图把帝国置于自己治下的梦想迅速破灭。

与佩尔迪卡斯的统一思想相比，继承者托勒密的分裂倾向则贯穿他事业的始终。如前所述，在亚历山大去世后，与其他继承者拥戴王室某个继承人不同，托勒密一开始就主张各位继承者享有平等的权力和声望，代表着马其顿平等传统的恢复，更暗示出他一开始就具有的分裂倾向。他的这种倾向被德罗伊森描述为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11]73}。托勒密的分裂倾向具体表现在：第一，抢占丰饶之地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公元前323年分封协议未定，托勒密便匆匆赶回埃及，因为在他陪同亚历山大访问阿蒙神庙时，他就已感到埃及的富足和它的易守难攻^[12]。第二，率先反对实力强大的统一者。每当出现强大的继承者谋求统一时，托勒密就公开率先反对，他不希望任何一个人过于强大^{[3]47}。当佩尔迪卡斯威望和势力不断上升时，托勒密首先挑战他的权威，把亚历山大的灵车劫持到埃及。此后安提柯在灭亡优美尼斯占有“整个”亚洲时，托勒密也率先向安提柯发难，要求安提柯与其他继承者平分其领土和财富^{[6]XIX.57}。第三，分裂倾向明显，奉行实用主义。当佩尔迪卡斯出征埃及失败后，托勒密拒绝担任帝国摄政，因为他知道安全地保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比诱人的帝国摄政名号要实际得多^{[11]73}，托勒密并不想使自己成为维护帝国统一的工具，他大概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最重要的是他并不想这么做^{[3]37}。再者，这样也可以避免与安提帕特公开对抗^{[7]66}。在托勒密成功抵抗佩尔迪卡斯的武力征服后，他更认为埃及是其用枪矛赢得的领土，随后的特里帕拉迪苏斯(Triparadisus)会议，可看作是对他占有埃及的一种官方承认。

与托勒密相比，亚历山大老将安提帕特虽然不是帝国分裂的积极倡导者，但其担任摄政之后，把王室从亚洲迁回马其顿，这无疑对帝国统一本身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客观上使马其顿又回到亚历山大之前的状态——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欧洲国家^{[3]38}。安提帕特把王室迁回欧洲使王室在亚洲的影响逐渐消失。要想统治亚洲，巴比伦是一个理想的统治中心^[13]。当然，我们不能依此来怀疑安提帕特对王室的忠诚，因为在他去世时，并没有把摄政之位给予自己的儿子卡山德而是选择了波吕裴康，安提帕特认为后者更能代表王室的利益。虽然此后波吕裴康为对抗安提柯，任命优美尼斯为“亚洲大将军”，以取代安提柯在亚洲的地位，但是优美尼斯却遭到安提柯不遗余力的驱逐，最终优美尼斯被安提柯处死，使王室在亚洲的权威彻底消失。安提帕特把王室迁回欧洲也与其实际经历有关。在亚历山大东征期间，他留守马其顿担任摄政、巩固后方，他是一位欧洲将领，一位老人，对亚洲并没有太大的兴趣^{[3]38}。

继佩尔迪卡斯谋求统一失败后，继承者安提柯也一直在追求帝国的统一。我们不能十分确定安提柯到底想些什么，但材料可以证实他从来不准准备将其势力局限在少于整个帝国内^{[5]36}。安提帕特带领王室返回欧洲，给安提柯在亚洲提供了很好的扩张机会。当安提柯处死优美尼斯后，其实力又急剧上升，控制了从小亚细亚到伊朗的大部分地区。公元前306年安提柯在其子占领塞浦路斯后便公开称王，而且对整个帝国称王。虽然在安提柯称王之后，其他继承者如塞琉古、托勒密、吕斯马库斯也纷纷称王，但是安提柯与其子都不予以承认。塞琉古被德米特里(Demetrius)的追随者轻蔑地称为“战象队长”，托勒密被他们称为“舰队总司令”，而吕斯马库斯(Lysimachus)则被称为“财务主管”^{[14]Lives IX.Demetrius XXV}。

但安提柯的统一也有自身的劣势。首先，安提柯仍没有统一帝国的军事实力。公元前319年

至前 316 年间,他在与优美尼斯的征战中屡遭败北,后因优美尼斯被银盾兵出卖,安提柯才得以打败优美尼斯。虽然占有“整个亚洲”之后实力大增,安提柯却依然没有足够的实力来战胜由塞琉古、托勒密和吕斯马库斯联合组成的反安提柯同盟,最后不得不签订公元前 311 年协议。以承认其他继承者对所占领土的管辖,这次协议是对安提柯统一雄心的沉重打击。此后其与塞琉古的战争也不断遭到失败,不得不放任塞琉古对伊朗以东领土的占有。第二,其性格暴烈而傲慢,被迫应对其他继承者的联合反抗。据普鲁塔克记载:若安提柯能够忍耐一下稍作让步,对于建立帝国的热情有所节制,不仅可以在继承者中维持最强的实力,而且在他去世以后还可以将这种优势传给儿子。他性格极其暴烈而骄傲,侮慢的言辞如同他的作战行动,激怒那些年轻而又有实力的继承者联合起来与他对抗。对于对手们的结盟,安提柯则认为他们如同一群飞鸟,只要扔一块石头或者发出一声吼叫,他们就会一哄而散^[14]Lives IX.Demetrius XXVIII。第三,不善于任用将领。在他打败优美尼斯后,便以谋反罪处死了与自己征战多年的培松^[6]XIX.46,逼走塞琉古,在军事上只能依靠自己的儿子德米特里。

安提柯势力的扩张必然遭到其他继承者的反对,而安提柯自身劣势又注定了他的失败。公元前 302 年反安提柯同盟再次形成,公元前 301 年,安提柯战死沙场,他试图统一帝国的愿望也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亚历山大继承者统一帝国的又一次失败。战后塞琉古、卡山德、吕斯马库斯对帝国遗产进行了重新分配,塞琉古几乎占有了亚历山大帝国在亚洲的大部分领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安提柯的消失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统一帝国的理念将逐渐被区域王国的现实所取代。

安提柯之后,其子德米特里仍梦想着亚历山大帝国的统一^[11]67,企图恢复其父王所占有的领土。为此他进行了大规模的准备,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征募了 9.8 万步兵,1.2 万骑兵,500 艘船只企图征服亚洲^[2]Lives IX.Demetrius XLIII。但是德米特里的东征立刻遭到塞琉古、托勒密和其他继承者的联合反对,刚进入亚洲既面临被包围的状态,最后在远征中被塞琉古囚禁致死。德米特里在自己的统一过程中劣势更加明显。一方面,德米特里虽然有恢复帝国统一的雄心,但他并不像其父亲那样意志坚定,更重要是他父亲去世以后,他没有意识到帝国的统一已不可能。在佩尔迪卡斯和安提柯二十多年的统一努力失败后,帝国分裂已基本确定,这一时期已不是实现“巨大梦想”的时代,而是要限制自己的雄心^[3]109。塞琉古对亚洲、托勒密对埃及的占领已基本确定,在当时的世界已没有为他飘忽不定的性情留有寻找平衡的空间。另一方面,德米特里与其父一样性情粗暴与自大,而且生活方式挥霍奢侈,更难得到广泛支持。其统治塞浦路斯时,当地人十分欢迎托勒密的统治,而不能忍受他的苛政^[3]108。在德米特里去世后,塞琉古战死吕斯马库斯曾闪现出兼并马其顿的念头,但他出师未捷身先死,塞琉古之死象征着最后一次统一理念的失败^[11]73。

由此,为何统一者一再失败,而不能将帝国统一在自己的治下?我们也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说明。首先,他们都缺少亚历山大那样恢宏的气度,更缺乏广泛的支持。佩尔迪卡斯的多疑,安提柯和德米特里的傲慢,使他们与亚历山大的气度相距甚远。另外,亚历山大为长久统治而推行民族融合政策,而继承者在亚历山大时期就反对希腊——马其顿人与当地人的融合,对非马其顿人的排斥既不利于自己的统治,也不利于帝国的统一。亚历山大去世后,除塞琉古之外其他继承者都与自己的伊朗妻子离婚,许多被亚历山大委以重任的伊朗人也被清除出领导阶层。他们对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时期一直受重用的优美尼斯也大大排斥,这种缺乏包容气度的做法,得不到广泛支持也就不足为怪。其次,更重要的是统一者拥有比分裂者更大的雄心,这让仍具有马其顿平等传统观念、想独守自己地盘的其他继承者不可能接受。再次,谋求统一者都不具有绝对的军事优势来战胜对手。因为在继承者战争中,往往是继承者通过结盟来共同应对实力强大者,取得胜利后共享成果,成为这一时期一贯的作战方式。这种作战方式使各方实力不断达到平衡,他们所占领土也在历次达成的协议中不断被确定。最终到公元前 301 年协议时,亚历山大帝国在亚洲、欧洲和埃及的三个部分正式分裂。此后,各继承者所占版图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直到他们逐个被罗马帝国所征服。

三、亚历山大帝国自身的现实

在古代世界,任何大帝国都有自己控制的极限,超过这个极限就很难处于自己的有效掌控之下,这从亚历山大帝国之前的波斯帝国和之后的罗马帝国不断对帝国边疆的征服中也可以看出。亚历山大帝国疆域辽阔前所未有,从西面的希腊本土到东面的印度,从南面的埃及、波斯湾到北面的色雷斯、里海、巴克特里亚一线。面对如此庞大的帝国,即使亚历山大在世,能不能进行有效地统治^{[5]36}。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亚历山大在世时为加强帝国统治而采取的诸多措施:首先,把首都定在帝国中心巴比伦以求达到对边疆地区进行有效的威慑。因为巴比伦处于帝国的中央,而且自古以来都是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其次,建立数以十计以亚历山大命名的城市控制战略要地。既依托城市达到对当地的有效控制,又可吸引和安抚希腊——马其顿人长期居留于此,据普鲁塔克记载亚历山大建立的城市有70多座^{[15]395},其中最著名的为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第三,推行希腊—马其顿人与当地的融合,鼓励将领和士兵与当地通婚。据阿里安记载亚历山大在苏萨举行了规模宏大的集体婚礼,结婚者达一万多人,亚历山大也率先垂范^{[1]VII.4}。并采用马其顿方式训练了3万波斯青年。第四,沿袭波斯旧制实行总督制,保留和任用一些波斯人为总督,以安抚当地人。

虽然亚历山大采取了这些巩固帝国统治的措施,但他去世之后远远不能保证帝国的长治久安,因为亚历山大去世时帝国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帝国对征服的领土还没有彻底消化。如前所述,对西里西亚北部卡帕多西亚地区还没有完全征服,色雷斯地区也因时常受到北部蛮族的入侵,而不得不派年富力盛的吕斯马库斯去守边。亚历山大所沿用的波斯旧制——总督制——可以说是统治大帝国行之有效的办法,这种体制也被后来的罗马帝国所采用,即所谓的行省制。但是总督制的实施必须有强大的中央政府作支撑,若中央式微,总督往往割据一方,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亚历山大去世后总督制仍然实行,却成为继承者权力分配的一种方式,这在继承者签订的历次协议中也深有体现。从公元前323年的巴比伦协议到公元前321年的特里帕拉迪苏斯协议,再到公元前311年协议和公元前301年协议,这一个个的协议不仅是对帝国领土的瓜分,也是以法律形式对总督所占领土的一次次承认。前三次的分封协议还有名义的王室存在,而公元前301年协议可以说是帝国的彻底分割,因为此时王室已不复存在。这也充分说明了在马其顿平等传统和统一者自身实力的限制下,将帝国统一在一个人的手中已不可能。当安提柯的势力从亚洲横跨爱琴海并把希腊纳入自己势力范围时,他也不得不自己管理亚洲,让儿子掌管希腊,在危机时才把他召回^{[3]61}。当塞琉古在晚年妄图兼并马其顿时,亦是事先让其子掌管亚洲。

更为重要的是,在继承者时代已没有了亚历山大即位时那种欧亚统一的有利条件。亚历山大能建立如此巨大的帝国,依靠的是东征给希腊——马其顿人所带来的激情、波斯阿黑门尼德(Achaemenid)家族统治的衰落与亚历山大本人所具有的政治军事才能。但这些条件在这时已不存在,希腊——马其顿人早已没有了那种征战的热情,这从士兵在印度希发西斯河拒绝前进也可以看出。希腊——马其顿士兵期望回到家乡过他们传统的生活。他们对滞留亚洲不感兴趣,所以一听到亚历山大离世的消息,就在帝国东部立刻叛乱试图返回家乡^{[6]XVIII.7}。

对希腊人来说,他们参加远征的目的是解决城邦危机和获得东方的财富,这也是雅典亲马其顿派代表伊索克拉底(Isocrates)支持腓力二世的原因,此时希腊人也基本得到了他们的愿望。再从希腊本土传统来说,他们更不希望有强大的君主来主宰他们的城邦政治生活,自由民主的城邦政治与专制的君主制无法相容。据狄奥尼索斯记载,希腊本土的起义是因为亚历山大要求诸城邦收回他们的流放者,并要求雅典放弃萨摩斯。亚历山大在世时他们可以保持沉默,但他一去世希腊人便公开反抗^{[6]XVIII.8},驱逐马其顿在希腊的驻军,以致在后来的继承者战争中,继承者不断地宣布希腊自由来期望获得希腊人的支持。

再者,亚历山大东征时不堪一击临阵脱逃的大流士三世已不复存在,统一者所面临的对手是随

亚历山大身经百战的将领。当年亚历山大进入埃及时,埃及人把他看做解放者加以欢迎,总督马扎西斯(Mazaces)客客气气的把他迎接到埃及的城市和乡间^{[1][3][4]},根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而佩尔迪卡斯和安提柯出征埃及时不仅遇到托勒密的强烈抵抗,也遭受自然条件所带来的灾难。面对其他继承者的联合反对,统一者既缺乏亚历山大那种统领全军的政治才能,也缺乏军事才能。加上帝国本身从上层的继承者到下层的士兵普遍缺乏向心力,这一切最终决定了亚历山大帝国的分裂。

四、结 论

综上所述,由于马其顿继承制度的不完善,在亚历山大去世后,王位继承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这逐渐加大了继承者之间的离心力。虽然依据马其顿的继承传统把亚历山大四世和腓力三世推上当时的政治舞台,立为国王,但因他们缺乏执政能力而更加速了王室的衰落。王室的衰落使其对继承者的约束力和向心力一点点地减弱,以致他们相互征战,加速了帝国的分裂。虽然在这四十年中,不断有继承者试图将帝国统一在自己的治下,但由于马其顿传统观念中平等观念和尚未形成的权威意识使统一者不断受到挑战,更由于他们自身的不足而相继失败。亚历山大帝国毕竟是突然崛起的帝国,对帝国的统一与管理从自身统治制度和民众心理上都缺乏必要的准备,因此,对于如此庞大的帝国,在缺少凝聚力和向心力时,帝国的分裂也就不可避免。

参考文献:

- [1] 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M].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E. I. Liff Robson,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 [2] Plutarch. Lives VII. Alexander LXXVII [M].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Bernadotte Perrin,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 [3] F W Walbank, A E Austin.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M]. Vol. I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4] Joseph Roisman and Ian Worthington. A Companion to Ancient Macedonia[M]. Mass.: Wiley-Blackwell, 2010.
- [5] F W Walbank. The Hellenistic World[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6] Diodorus. The library of history of Diodorus of Sicily[M]. Book XIV. 37. 6,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Russel M. Geer,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7] R M Errington. From Babylon to Triparadeisos: 323-320 B.C[J].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 90 1970.
- [8] Grace Harriet Macurdy. Hellenistic queens: a study of woman-power in Macedonia, Seleucid Syria, and Ptolemaic Egypt[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32:9.
- [9] (古罗马)奈波斯. 外族名将传[M]. 刘君玲,译;张强,校.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79.
- [10] John D. Grainger. Seleukos Nikator: Constructing a Hellenistic Kingdom[M]. London: Routledge, 1990:20.
- [11] 陳致宏. 德國史家朵伊森(J. G. Droysen)的歷史思想與現實意識[M]. 國立臺灣大學叢刊,2002.
- [12] Cuthbert Lattey. The Diadochi and the Rise of King-Worship[J].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17, 32(127):321-334.
- [13] E R Bevan. The House of Seleucus[M]. Vol. I, London: Edward Arnold, 1902:37.
- [14] Plutarch, Lives IX. Demetrius XXV[M].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Bernadotte Perrin,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 [15] Plutarch, Moralia. IV[M]. On the Fortune or the Virtue of Alexander, 1.5[M].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Frank Cole Babbitt,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395.

责任编辑 张颖超